

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教會和神學

楊天道



中國城市化的步履已經悄然邁過30年的光陰，今日的人們對林立的高樓華廈、擁堵的車流人群、迭變的街景市容，早已熟悉得不再訝異激動。關注中國教會發展的觀察者，也必定留意到鄉村風格正淡出畫面，現代節拍在鏗鏘登場。當田園氣息漸行漸遠，中國教會面對的直接挑戰，便是城市宣教的課題。城市宣教的觀念激發著基督徒對城市文化與城市教會的認知，也要求中國教會的神學和神學教育作出毫不含糊的調適。教會是否準備好迎接城市群體的歸主？我們的信仰能否承載城市生活的獨特形態？筆者嘗試透過本文，提出這一背景下神學的潛在危機和新的考卷。

城市化中教會面對的危機

城市化並非世俗化的同義語，教會的城市化也不是「和其塵、同其光」的隨波逐流。但城市化和世俗化一樣，觸及人們生活的每一層面——政治、經濟、教育、職業、人際溝通等等。對教會而言，城市化的影響至少發生在下述幾種意義上：

首先，城市化的機遇驅使越來越多的年青人離開家園，與原本塑造他們生命的家庭關係和傳統分離。城市中的人際關係多半徒有廣度而缺乏深度，但同時也增加了信仰團體的吸引力。因為信仰不是架空真實的關係，而是加深人們對關係的委身。傳

統也並沒有遭拋棄，只是新的傳統代替了舊的傳統，例如看重質量而非數量，強調當前而非未來。教會所展示的文化傳統，至少可以成為人們面對新環境的另一選擇項。

第二，城市化帶來的並非集中而是分散，並非整齊劃一而是千人萬面，並非通識全才而是專業分工，並非權力集中而是權力分享。這種個性化的需要，否定了任何理論一統江湖的地位，卻呼喚著能夠回應獨特處境的生動信仰。權力架構的改變造成新型的業主身份和忠誠意識，使人更易於參與和委身團體之中。這正是「信徒皆祭司」真理所指向的，也是教會的任何事工得以進行的前提。

第三，城市化隱含的一個觀念，是將生活劃為公眾領域和私人世界的二分法。尊重他人權利和自由的意識，造成我們對旁人的生活方式無權置喙，倫理與信仰漸漸落入個人選擇和隱私的範疇。然而，標榜寬容的心態背後是對結構性犯罪的無動於衷、道德尺度的日益模糊。教會對倫理規範的堅持和對罪的指責，無疑會冒犯城市人的心理界限。但特立獨行的價值觀，正是教會為信仰作見證的合法資格。

上述的粗略觀察，提醒我們當代中國教會在神學上面臨的多重危機。

首先，未經深思熟慮的實用信仰，正在被理論

的提煉和理性的思考取代。隨著神學知識的普及和易於獲取，信仰的學術化已經初見端倪。但教義爭辯和論證的結果，可能會使信仰變成一種習慣；銳利的批評眼光，也容易淪為不健康的懷疑。基於信心的對神的認識和自我判斷，有淡化為專業知識或學問的危險。

第二，聖經漸漸從我們的信仰中缺席，表現為基督徒對聖經越來越生疏，從言必稱聖經變成讀經的興趣索然。我們對世事了然於胸，卻對神的事不再熟悉；教會注重牧養和事工，神學化為少數人的自我信念。對於聖經的姑且聽之的看客心態，使得神的話語、基督信仰的文化、基督信仰的歷史，乃至神的百姓都與我們毫不相干。

第三，二元論的思考方式使得我們的信仰越來越抽象空靈。特定的神學條目雖然可以反覆教導，卻不能面對變化的社會情境。假如福音派神學不能引向城市生活中的職業、家庭、經濟倫理，我們便注定無法在世俗主義之外，留給人們可行的選項。當基督徒只有依據心中的感動而行事，結果便是福音的私有化和教會的孤芳自賞。

以神為中心的神學

對這些浮現出來的危機，教會可以如何回應，我們當下的課題又是甚麼？

首先，中國教會應該發展以神為中心的神學，即以對神的知識作為首要的內容，將神的百姓作為首要的對象，將成就神的意圖作為首要的目標。這不單是要求我們重視「神論」的問題（中國教會中神論的空白自不待言），更是提醒我們神學真正的身份和存在目的，永遠是為了參與神在教會中和世界上的工作而預備神的百姓。以神為中心，才有可能融合銳利的學術批判與清醒的自我判斷。我們確信神的判斷遠超過我們自己的批判性，祂是比被造物更偉大的創造主，同時又是憐恤罪人的聖潔主。祂不為滿足人即時的、現實的需要，卻擁有宏大永恆的護理計劃。這樣的覺悟令我們在祂面前時時屈膝，從而將神學引向驚嘆、引向禱告、引向敬拜。如此，神學不僅是護教性的，更是啟發性的。

更進一步，神學是關係性的，它將我們所認識的神與我們和神與世界的關係傳達給他人。我們可以作出神學的思考，正因為神與人的關係給我們

提供思考的材料。神學固然有客觀的一面，與今天的情境和信仰經驗保持水平的間隔，但這距離也會威脅到神學本身的正當性。我們不可停留在情報性的層面，而是要進入關係性的層面，在神的話語中遇到位格性的「祂」與「你」。所有真正的神學提問，都伴隨著主體的信仰告白。正像耶穌在該撒利亞的腓立比向門徒的詰問：「人說我是誰？」這是客觀的問題；「你們說我是誰？」這是告白性的主觀提問。耶穌為我們展示了一條正確的神學路線，祂所批判和超越的是法利賽人那種虛假冰冷的神學。我們在與神的關係中理解祂是何等的一位、祂對我的心意如何。城市人急待進入的，也正是基督徒與神那種清醒的、位格性的關係。

其次，中國教會應該致力於塑造聖經文化，而不是意義模糊的基督教文化。文化由人創造，人也在文化中形成自身的人格。城市化大潮中的人們，接受新處境的挑戰發揮自己的潛力，也改變自身所繼承的傳統以適應之，從而發展出更新的文化。這樣的反覆中，文化行使了對城市人的再創造。而人們在城市文化中始終是被動者，最終離神越來越遠，淪為文化的奴隸。真理既然給我們自由，信仰應該將我們從為奴之地拯救出來。為此，神學應該根據聖經重新尋回自己的定位。歷史上的宗教改革無意另創一種文化，事實上中世紀已經擁有傲視歷史的基督教傳統。但宗教改革產生的傳統，是從不止息地通過釋經努力讓神學合乎聖經，這種努力的結果是前所未有的信仰動力和社會影響。教會傾力於神的話語，是讓聖經中神的事件成為我們的信仰事件、神國的文化成為我們的文化。否則我們將喪失神話語的能力，重演歷史上教會墮落的悲劇。

中國教會需要更多的聖經學者，他們的角色是為教會的教導提供知識的工具與資源，這類工作是我們的信仰傳承到下一世代的保證。不單是神學工作者，所有的傳道人都當致力於「按正意分解真道」。我們要提醒自己，教牧的職份中首要的是培育神的百姓（教職），而非訓練神的工人（牧職）。我們不應顛倒了教牧的順序，而用事工侵蝕甚或取代了足夠的教導。信仰的傳承，不僅發生在上一代與下一代之間、講台和聽眾之間，也發生在神的百姓中間。我們可以期待城市教會中平信徒神學家的興起，來輔助教會的教導事工，讓認識神的

知識在祂的百姓中擴展。

最後，神學本身雖然超越處境，但神學一旦與教會的處境斷裂，教導便失去敏銳和果效。無論在教牧事工、平信徒事工、傳福音，還是在社會關懷中，對處境的足夠理解必不可少，對社會的分析評判至關重要。中國社會正處於史無前例的變動中，城市化引發的經濟不安、倫理觀的變化、物質萬能主義、個性化的文化，無一不造成傳福音的困難，也要求我們積極尋找對策。脫離這一現場，反覆教導劃一的神學，不但缺少意義，也有負我們作為上帝僕人和先知的使命。當然，將聖經中教導的原理移植到城市的現實，需要多年的神學教育。即使神學畢業，也難以將學分代表的知識，自如地運用在瞬息變化的處境中。為此中國教會需要開始對社會變動的動機和過程的綿密研究，即使教會的社會參與仍有諸多限制和不便。甚至更進一步，我們要能夠預測10至15年後的處境變化，因為教會現今的改變，也要10至15年的時間才能真正發出果效。

教會的生命力與神學的影響力

中國教會能否在迅速世俗化的社會中，在拒絕客觀真理、規範標準的後現代心態中生存立足，取決於我們的神學是否願意脫離「屬靈 - 屬世」的二分法。城市化的處境提供神學思辨的資料，但神學不僅是思辨的理論，也是溝通的學問。真正的神學既是超越（transendent）的，又是屈尊（condescent）的。城市化迫使中國教會的神學也必須成為對話的神學，神學的教育應該培養信徒，尤其是傳道者與世界對話的能力。這不僅是在傳福音的事工中，也體現在回應處理各種社會事件的過程中。當教會與不同心靈、視野和傳統展開對話，我們的神學勢必在溝通中取得發言權，乃至影響力。基督教的價值觀未必成為社會的主流，卻終將在多元的文化中佔領一席之地。

在中國急速的經濟增長和以都市為中心的產業社會化中，城市教會的崛起已經是公認的事實。教會的增長帶來對

城市型牧者的需要，不計其數的神學培訓部門已經建立起來。神學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養教牧人員，但其次的使命是造就社會的領袖。教會無法影響社會，表明神學教育的欠缺。但低素質的神學教育，反映的恰恰是低質量的神學。在神學從未真正發展起來的背景下，真正意義的教會復興不過是紙上談兵而已。城市宣教的新課題，再次提醒教會發展出具生命力和影響力的神學。教會和神學不應成為靈性貧困和思維懶惰的避風港。

城市化的進程，是神對中國教會的挑戰，也是我們真正復興的良機。

（作者為美國三一神學院神學哲學博士，現居於國內，分題為編者所加）

